

#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的新进展

曾雄佩 信瑶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型,中国经济在取得不凡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挑战,经济实践极具中国特色,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或采用单一方法与视角并不足以充分诠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演进路径与内在逻辑。基于此,中国经济史学界对近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问题给予了足够关注,在研究中不仅坚持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并重,而且采用了更为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with 视角,这一研究特征在近年来的学术会议中得以充分体现。

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上财经济史学 Workshop”,旨在搭建一个更高层次的、经济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加强经济史学研究领域新方法、新视角和新问题的深度交流和探讨,更好地从历史与思想层面解读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上财经济史学 Workshop”已成功举办三届。首届会议聚焦中国清代金融市场的发育和整合,对区域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和宏观金融发展进行了重新思考。<sup>①</sup>第二届以新史料、新数据、跨学科方法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组织、思想、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进行了探讨。<sup>②</sup>2018年7月举办的第三届“上财经济史学 Workshop”暨“历史与思想:近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研讨会则聚焦近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与思想,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相结合的视角来透视历史实践、梳理思想流变、提供现实镜鉴。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50余位海内外学者共同参与了本次会议。会议提交的论文体现了对近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研究的最新态势:关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互动;重视金融在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注重将经济思想与经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从经济思想视角来探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源泉。

## 一、关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互动

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且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对政府、市场与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有利于突破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固有框架,对经济发展主要影响因素的综合考虑也使得结论更具有解释力。除了关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元互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基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互动视角的研究,能有效解释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疑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教授研究了1900至1937年间中国的金融革命。这时期虽然中央政权部分瓦解,但金融市场却经历了迅速的发展。研究发现,该时期公债市场持续稳定发展,并且随着位于通商口岸

[作者简介] 曾雄佩,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邮箱:zengxiongpei@126.com。信瑶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邮箱:yaoxin\_sufe@163.com。

① 燕红忠、王昉:《中国金融史研究的动态与新进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② 王昉、曾雄佩、许晨:《制度、思想与社会组织: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径》,《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尤其是上海地区中外银行数量的增加以及中国海关作用的突显,逐步形成了商业社会所必需的可信承诺机制,这使得银行发行纸币,吸收存款的能力大增,进而激发了这一时期的金融和货币革命,并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于政权的金融体系。但随着国民党政府对金融行业控制的逐渐加强,该金融体系渐趋衰落。

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以及政府与金融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之一。上海社科院贺水金研究员考察了抗战初期金融市场的波动,认为国民政府针对因战争爆发而导致的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政策成效显著。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王路曼博士基于清朝官员奏折、中外报刊及学者笔记对1910年上海金融危机进行了再解读,认为相比金融市场本身的盲目投机,国家层面政策的不完善通常才是金融危机的主因。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节点将抗战时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对这两个阶段沦陷区金融市场运行的状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认为政府利用金融为其政治目标服务是贯穿其中的本质特征,而另一个本质特征是投机。

社会组织、社会文化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备受研究者关注。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考察了中山商人的商业组织与经济活动,对跨地域商人在跨国经商中的挑战以及商人组织在经营方式中降低风险的措施作了分析,认为基于血缘与地缘的关系网络是中山商人减低风险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也促进了一些新创的商业制度在近代中国出现。南加州大学布雷特·希恩(Brett Sheehan)教授通过研究1932—1950年间天津东亚毛纺厂资本来源与股东结构的变迁,发现在工厂发展的过程中熟人(朋友)所占股份比例逐步降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成为股东,据此认为在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大背景下,传统文化在企业招股过程中的作用变得相对不再重要。

## 二、注重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熊彼特早在1912年便提出了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加速技术创新并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sup>①</sup>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被理论与实证研究所证实,经济史学家也越来越重视金融在经济转型发展中的作用。新世纪以来,金融史更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热点。燕红忠教授通过考察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认为经济现代化必然伴随着金融的加速发展,而且各国的政府行为、金融条件及发展路径将直接影响其经济发展进程。<sup>②</sup>由此可见,金融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此次与会学者就金融的概念以及金融在工商业发展、企业经营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复旦大学孙大权副教授对“金融”一词产生的时间和本土化过程进行了详细考据,并深入研究了该词语含义的演变过程。上海财经大学赵婧博士运用《钱业月报》刊载的1921—1932年“遗失票据”数据对上海金融业的放贷情况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钱庄在工业融资过程中作用重大,相比银行,钱庄与近代工商业的关系更为密切。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张跃博士详细梳理了近代中国企业商号吸收储蓄存款的历史脉络,发现私人信用和无限责任是企业商号成功吸收储蓄存款的制度保障,而储蓄存款为许多企业商号顺利经营提供了有力保证。

也有学者对影响近代金融市场发展的因素作了讨论。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薛华(Carol Shue)教授检验了19世纪外国制度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由于可储藏的谷物粮食具有可用于投资的性质,所以,根据资产定价模型,谷物价格的变化能有效反映当地利率水平。在此基础上,薛华教授利用中国近代粮食数据对与资本市场紧密关联的系统性利率做了估算,发现引入了西方贸易、法律等制度的通商口岸城市利率水平下降、资本市场表现提升。上海师范大学赵红军教授考察了

① [美]熊彼特著,孔伟艳等编译:《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2页。

② 燕红忠:《财政转变、金融发展与经济转型——兼论中西方长期金融发展中的“分流”与“合流”》,《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1819—1919年海外白银流入与宁波口岸被迫通商这两个外来冲击对银铜本位货币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就通商口岸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强制性开放通商口岸会对已有市场化的货币制度造成不利冲击。

金融制度变迁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可以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次会议有多篇文章介绍了金融制度、货币制度或者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变迁,有的还对其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作了探讨。例如,上海财经大学燕红忠教授系统介绍了近代中国内汇市场的整体发展和变迁。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基于制度创新与业态竞争的视角分析了新式银行与票号的兴衰更替历程。河北师范大学康金莉教授对北京政府时期北方地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规模和结构进行了量化统计与分析,并据此对北方民族资本主义相关问题做了解释。复旦大学韦森教授从货币的职能出发分析了东、西方货币制度的差异,即西方以金银铸币为主,而中国则主要采用铜铸币,并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各国不同社会制度的演化路径。

金融市场整合是当前金融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上海财经大学杜恂诚教授认为,市场整合应该是指各地要素价格相等或趋同。他通过对1921—1922年上海、苏州等几个主要城市的洋厘和银拆旬度数据进行一系列平稳性检验,发现中国近代货币市场不仅货币标准紊乱,而且基本处于分割状态。北京大学赵留彦副教授利用上海、天津及汉口等城市的洋厘数据,采用门限自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1898—1933年中国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发现此阶段尤其是进入民国之后,中国货币市场整合程度呈现不断加强的特点。

### 三、重视经济思想与经济现实的结合

经济史学的研究重视经济思想与经济现实的结合。近年来,经济史学研究在立足经济现实探索经济思想的适应性,利用经济思想来解释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基于经济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来解读当时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也颇为丰富。

此次会议基于现实背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过去对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常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概念和术语进行“对口径”式的解读,从而造成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贫乏或不成体系的误解。上海财经大学特里·皮奇(Terry Peach)教授认为现代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了大量术语、概念并应用其进行分析的体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并不具备这一系列特征,这与当时的现实背景及需求有关。首先,古人并不需要这类经济分析,他们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更多地反映出其哲学思考;其次,古人并不需要亚当·斯密式的自由经济体系;最后,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基础在于其认为人类具有的欲望产生了各种社会与经济问题,因此需要去控制这种欲望。

经济思想要适应经济现实,与会学者们就如何提出与中国经济现实相一致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梁华编审认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是基于特定的经济现实,我们要重新审视经济思想与经济现实的关系,在吸取超越时代特征的西方经济思想同时,立足中国现实国情,建立能够解释中国问题并指引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经济思想。另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并拥有许多值得珍视的亮点,可以为解决当前中国现实问题提供一定历史借鉴。<sup>①</sup>复旦大学周文教授强调,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既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同时也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

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经济现实问题进行解读,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北京大学张亚光副教授通过梳理晚清西方对华贸易的观点,认为中西方贸易矛盾体现的是传统中国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秩序间的冲突和张力,这为研究清朝政治秩序的解体提供了新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梁捷博士通过研究马寅初人口控制论提出的背景和过程,将该研究放置于当时特定的

<sup>①</sup> 程霖、陈旭东、张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

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得出马寅初的人口思想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家资金紧缺这一现实问题的结论。伦敦大学的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博士基于口头采访、查阅私人档案以及研读中国主要的出版文献,认为价格双轨制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所在,该制度虽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但在当时确实能够使整个社会、政治以及经济体制在外部冲击下依然保持稳定。

经济思想与经济理论对经济现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曼彻斯特大学保罗·凯莫克(Paul Cammack)教授就一些国家与机构对亚投行的成立持不同态度,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做了解释。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这一完善全球经济市场的重要举措遭到美国反对,但美国的盟友以及以世界银行为首的很多国际组织均表示支持,传统的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却能够对此进行有效解读。该理论在关注国际市场完善的同时也强调国际竞争,认为亚投行的成立在完善全球市场的同时也导致了世界经济中心东移。

#### 四、从经济思想视角探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源泉

在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新的经济实践与经验层出不穷,经济学理论也要求与时俱进。经济学的发展演进不仅要立足当前经济现实,还要从经济思想的视角追溯其理论源泉,中国经济史学界已对此作了不少有益尝试。例如,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将结合中国经济实践,通过对近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历程进行深入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提供理论资源与思想积淀。

立足中国经济实践,从经济思想视角来探索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源泉在本次会议中也有所体现。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通过回顾价值理论的发展过程、辨析经济思想史中对于价值理论的一些误判,认为传统的价值论均为狭义价值论,无法充分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他提出从广义价值论出发构建解释中国经济现实与问题的新逻辑和新框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魏众研究员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按劳分配原则中国化的探索历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按劳分配原则的中国化历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尝试从总体上厘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体系。复旦大学孟捷教授通过反思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世界历史的实质是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即从根本上要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匹配,并试图以此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方法论基础。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强调,面对新环境、新问题,必须将理论方法与经验实证相结合,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王朝科教授指出,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是这门学科理论演进或者思维行程的根据和原则,他认为“剩余产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这次会议充分展现了经济史学界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趋势。经济史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视角与方法,更加注重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互动,使得研究更具有解释力;在对金融史研究的重视下,出现了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研究中强调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相结合,同时从经济思想视角来探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源泉,探索能够充分解读中国经济现实的经济理论。但我们的经济史学研究还有很大的不足,正如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魏明孔研究员对当前经济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的总结:一是学术评论跟不上;二是经济史资料的挖掘虽呈现井喷式,但对资料甄别不够;三是各种研究方法交流不够,历史学的经济史、经济学的经济史、社会学的经济史各自为政;四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相对较少。这要求经济史学者在未来研究中,要更加谨慎地对待历史资料与数据,进一步推进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开展更多长时段、大视野的中国经济史和中外经济史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王姣娜)